

比较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张依婷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

摘要: 苏联模式曾长期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模板”, 但因内在结构性危机而未能自我革新, 终成苏联解体的制度根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中国在经历了对苏联模式的移植、反思与突破之后, 走出了一条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种性质, 两种模式”的不同结局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在哪些维度上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本文将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展开比较分析。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模式; 超越; 比较研究

DOI: 10.64649/yh.shfzykjc.issn3078-8994.202607015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模式的内涵阐释

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

方向决定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 邓小平亦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3]。从方法论层面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层内核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苏联模式的移植也不是西方模式的翻版, 而是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立足当代中国国情与时代条件的创造性成果。

1.2 苏联模式的内涵

苏联模式指的是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社会主义建设体系, 这一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苏联国情下的具体呈现。1936年, 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4], 标志着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十月革命胜利后, 苏联面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包围的严峻形势, 为了尽快建成工业强国、实现工业化, 苏联不得不采取高度集中的体制。斯大林对此有清醒认识: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 或者我们被人打倒。”^[5]在具体制度层面, 苏联模式具有鲜明特征。在经济上, 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 一切经济活动由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管理, 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在政治上, 苏联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政权, 但党政不分、个人集权、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日益突出。在文化上, 苏联坚持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指导地位, 但实行思想管控, 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视为唯一真理, 学术自由受到严重压制。

值得指出的是, 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探索的初步成果, 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加快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等方面体现了其历史作用。但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没有任何先例可循, 加之主观认识的片面性和外部环境的严峻性, 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和弊端。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苏联经济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国有制为主体的单一所有制结构、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管理体制, 以及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排斥。这种模式在工业化初期曾发挥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经济体系的复杂化, 国家所有制与较低的生产社会化水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2.1.1 从“制度对立”到“手段融合”的理论飞跃

苏联模式的根本症结在于将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绑定为社会主义的“基因密码”, 而将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专有属性”。斯大林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本质直接挂钩, 视其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属性; 与此同时他将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 因而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消解乃至废除商品经济。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观, 使苏联经济体制丧失了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能力。中国的突破首先在于认识论上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明确指出: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 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开创了先河。

这种手段融合的理念,既保留了国家对重大战略的宏观掌控力,又激发了微观主体的空前活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2.1.2 从“排斥商品”到“驾驭资本”的实践转向

苏联模式长期将商品货币关系视为资本主义的“残余”,斯大林虽晚年虽承认消费品领域的商品交换,但始终将价值规律严格禁锢于流通环节,拒绝其进入生产领域。在指令性计划下,货币、价格等范畴虽存在但不能发挥固有的职能作用,中央指令性计划取代价格进行资源配置,导致企业缺乏市场信息、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而中国不仅全面承认并大力发展商品市场,更在改革中逐步学会“驾驭资本”。通过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释放了资本的创造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在制度层面要求巩固公有制经济,在理论层面则通过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超越了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奠定了坚实基础。

2.1.3 从“封闭自守”到“全球融入”的格局重塑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属于排斥外部市场的内向型机制,冷战期间苏联构筑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贸易网络并排斥西方世界经济体系的参与,此种封闭性结构的长期影响使其难以发展成拥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大国。中国则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开放之路。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主动将自身纳入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解构了资本逻辑与现代性逻辑之间的捆绑关系,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有效驾驭资本的现代化新路径,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守住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底线,实现了对西方经典现代化范式的超越。

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个人集权制、党政不分制和党政官僚特权制等,构成了苏联政治模式的制度骨架。改革开放后,中国针对这些弊端展开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探索。

2.2.1 从“个人集权”到“制度规约”的权力结构重塑

苏联模式在权力运行上的根本特征,是以领袖个人意志取代制度规范的“人治”逻辑。党内民主形同虚设,集体领导原则遭到架空,最高决策高度依赖于个人判断而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此种权力结构不仅在政治上造成了决策失当与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还借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经济、文化领域全面渗透,使整个国家机器沦为行政指令的单一执行工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权力结构上的根本变革在于实现了从“个人集权”向“制度规约”

的历史性转型。中国共产党深刻汲取苏联“人治”模式的历史教训,将制度建设置于治党治国的突出位置,通过建立健全集体领导制度、民主决策机制、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以及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使权力在制度的框架内规范运行。既确保了政治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也有效防止了权力过度集中所导致的体制僵化与治理失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政治保障。

2.2.2 从“党政不分”到“职能归位”的治理逻辑转型

苏联模式下的党组织全面覆盖国家机器与社会生活,“以党代政”导致行政体系沦为党的附属执行机构,政府治理的专业性与效率严重受损。这种党政不分、重视集中而忽视民主的体制使国家政权缺乏有效监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明确将“党政分开”作为首要突破口,要求党回归“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领导核心职能,将具体的行政管理权交还政府。与此同时,大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引入具有现代管理色彩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打破了苏联式的干部等级授职制,使政府治理逐步向专业化、科学化迈进。

2.2.3 从“垄断封闭”到“多元协同”的制度生态丰富

苏联“一党制”在实践中滑向排他性封闭体制,社会参与与监督机制缺失,个人崇拜盛行,导致政治系统趋于僵化。中国则构建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超越了一党垄断与多党竞争的两极模式,形成了执政—参政协商合作的新型政治生态。民主党派通过政协参与决策与监督,为制度注入吸纳社会意见、化解矛盾的弹性空间。同时,人大制度的立法与监督职能持续做实,为国家治理夯实了民意根基。

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上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苏联文化体制的高度集权化与斯大林拒斥资本主义文化成果的做法互为表里,最终使苏联文化在制度框架与思想生态两方面陷入封闭与僵化。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化体制基本沿袭苏联模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文化建设领域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

2.3.1 从“自我封闭”到“开放互鉴”的文明视野

苏联将资本主义制度与其文化成果等同视之,以阶级斗争逻辑否定外来文明,致使其文化与世界潮流隔绝而日趋僵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认识论上的重大飞跃,明确将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加以区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从世界近代史的高度指出,拒绝外来先进科学文化的民族绝无发展进步的可能^[7]。这一论断彻底打破了“姓资姓社”的文化对立观,使中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前提下,以开放心态系统引进、吸收和消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走出了苏联式的文化封闭陷阱。

2.3.2 从“话语垄断”到“双百方针”的学术生态

斯大林垄断文化领域话语权,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均须与斯大林的政治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并被确立为不可逾越的政治准则。此种体制从根本上抑制了文化创新的活力,致使苏联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在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中逐步滑落。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从理论上触动了苏联模式的文化体制弊病,然因种种历史条件所限,未能得到持续贯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双百方针”得以重新确立,邓小平明确主张取消以行政命令干预文艺工作的做法,并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决议》中进一步将自由讨论与学术创新确立为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准则。这一方针的本质,是承认文化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政治不应越俎代庖,它使知识分子从“被改造的对象”转变为“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从根源上激活了文化的自我更新机制。

2.3.3 从“高度集权”到“尊重规律”的运行机制

苏联的文化体制与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结构具有制度上的同构性,行政权力对文化运行的全面主导,使其背离了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文化机构由此丧失了应有的活力与弹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同样面临管理过死、统得过严等结构性困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理念上坚持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尊重,实践上则将承包制、竞争机制等经济手段嫁接于文艺表演领域以释放活力,并着眼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与规范。这一系列改革举措,使中国文化运行机制实现了向更加灵活、更为多元的制度形态的转型。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14).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2:27.
-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 [4]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 [5]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 [7]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58.
- [8]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5.
- [9] 习近平.必须坚持守正创新[J].求是,2024(23):4-14.

作者简介:张依婷(2002.10—),女,汉族,湖南郴州人,本科,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超越的意义

3.1 对中国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条道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有力载体。

3.2 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一时甚嚣尘上。然而,中国共产党顶住各种压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创造中国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符合本国特点的建设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它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前景的、可以与时俱进的制度形态。

3.3 对人类文明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单线进化论,为人类文明提供了非西方现代化的全新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9]中国道路改变了现代化的“单一趋向”,突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论”,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深化了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规律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当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凭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现代化征程时,其价值必然超出一个国家的范畴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